

网络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研究

范敬群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从斯图亚特·霍尔的电视研究的结论出发,参考葛兰西霸权理论及舒茨对意义的理解,假设网络话语意义生产同样存在着编码/解码的过程,而且还存在着弥散与重组过程,但因“传”与“受”的模糊,这个过程不再是二元的对立,而且远比电视话语的过程要复杂。

关键词 网络话语; 意义; 生产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09)02-0114-04

Study on Producing and Transmitting of Meaning of Network Discourse

FAN Jing-q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his study promot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at there exists the proces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when the meaning of network discourse is produced. This point is put forward in accordance with Stuart Hall's research on TV and Schutz' Hegemony theory of Gramsci. In the meanwhile,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at the proces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does not oppose dualistically and it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e discourse of the TV for the illegibility of the process in "transmitting" and "receiving".

Key words discourse of network; meaning; producing and transmitting

随着 Web2.0 技术的兴起,网络所表现出的去中心化、非权威化的特性模糊了传统认识上的“传者”与“受者”的区别,这些使人迷惑的颠覆特质让不少学者认为,网络不仅仅是“第四媒体”,甚至是人类传播和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

近年来,徐本禹等一连串网络表达让人感到网络话语的强权。与此同时,该领域也表现出理论研究的缺乏。网络话语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它怎样传播?网络话语中意识形态的功能如何体现?各个阶段的研究均十分缺乏,仅有的研究也只局限于某些个案的、针对传播效果的研究。考察这些效果研究,潜意识存在着“传”与“受”的二元对立,正是一方面强调网络的匿名与交互,一方面骨子里却是挥之不去的“启蒙”精神导师似的情结,妖魔化网络、无

限夸大网络民主和自由等论点颇有市场。而在 web2.0 迅速成为现实的今天,传统的、经典的各种理论在网络面前,其实面临着“失语”的尴尬境地。

参考葛兰西霸权理论,斯图亚特·霍尔及莫利、洪美恩等人对电视话语编码/解码的假设与实证研究,让人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一、几个概念的分析

话语是一个常以不同目的而被广泛用于许多不同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术语。事实证明,“语言”的抽象概念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达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

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同时指涉及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1]。媒介即信息,网络本身改变了言说、表达,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特殊制度化的表达。那么,网络话语不是在冷冰冰的光缆和硬件中流动的数字符号,而是意义再生与流动的过程,是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

在传播研究的语境中,意义属于研究对象,而不是先于分析而存在的一种给定或不言而喻的东西。因此,意义不应该被假定居于任何东西之外,不管它们是文本、言说、节目、行动或行为,即使这种活动和对象可能被理解为充满意义^[1]。

按照舒茨的阐述,意义来源于主体,是在主体意向性的活动中被构成的。当意义构造不断地积累增长,就构成了“库存知识”(stock of knowledge),人们正是利用这些“库存知识”来理解世界的。舒茨用主体间际世界很好地说明了韦伯提出的含混概念——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2]。在虚拟世界隔着液晶屏和网线交流,理解他人靠的是在主体间性的“库存知识”上形成的经验图式,从而赋予行动以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考察人类经济活动时,提出了生产、流通、使用(交换或消费)以及再生产四个阶段“四分法”。在霍尔等人看来,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存在着类似的意义“生产”、“成品”与观众“解码”三阶段。在生产环节后(或是结构其中),传播是其中意义的协商与交换的过程,通过该过程,讯息、文化中人以及“真实”之间发生互动,从而使意义得以形成或使得理解得以完成^[3]。

二、电视研究中的编码/解码的启发

如果我们从一个颇有相似之处,却更早出现、现在强势地位仍未受到根本冲击的媒体——电视的研究出发,也许能得到有益的启发。和渐现颓势的报纸相比,大约没有人能否认电视在大众文化中现今的统治权,无论网络视频多么的发达,但守在沙发边一边吃着零食、一边换着遥控器还是当前中国家庭最主要的休闲生活之一。频道转换之间,人们就在实践着现实世界的非现实化。相同的结论是,在网络世界,打开或关闭浏览器,我们也在实践着现实世界的非现实化。

提到电视研究,斯图亚特·霍尔的《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一文是怎么也绕不开的巨著。该文原

写于1973年,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篇油印文章,修改后收入1980年出版的《文化、传媒、语言》一书。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研究中,被认为是摆脱悲观主义阴影的一篇划时代的文献。该文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流通、使用(包括分配或消费)以及再生产四个阶段。霍尔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也存在同样的阶段。就电视话语的流通而言,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相对独立的存在条件^[4]。

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也是所谓的“制码”阶段。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的电视作品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这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意识形态问题,如观众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立场等。在这里,霍尔提出了著名的三种解码的假设:“支配—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和“对立码”(oppositional code)。霍尔的核心观点是,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3]。在他的研究中,除可以分析出舒茨的对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的阐述,我们更容易找到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子。

对霍尔的假设进行经验层面论证的是英国学者大卫·莫利和执教西澳大学的洪美恩等,莫利《“举国上下”的观众》与洪美恩《看〈豪门恩怨〉》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引入观众研究。

三、网络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

在霍尔的三个阶段中,第一、第二阶段分别是意义生产和成品阶段。之所以有一个成品阶段,是基于电视的金融经济的考察^[5]。事实上,这两个阶段可以统一理解为意义的编码阶段。按照舒茨对意义的理解,节目完成了,就是主体间性的“库存知识”上的经验图式得以形成。

但在所有的网络新闻传播、电子商务、娱乐资讯服务、博客与播客、即时聊天等活动中,由于“传”、“受”的模糊,网络传播中用“发起者”、“参与者”来比照传统媒体的“传播者”和“受众”更符合实际。网络话语的意义生产与传播就在发起者和参与者的共同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得以完成。特别要指出的是,与

电视话语有严格的时间逻辑不一样,编码/解码不能按照时间线来区分,事实上它们总是交互着的同时发生。

以此为出发点,考察网络话语的意义生产过程,我们会发现网络话语很难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品阶段。发起者的文本只是一个半成品,而真正的完成者却是众多的参与者,这个动态的过程让话语的文本不断的变化和丰富。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的帖子(以下简称“《两》”)为例,这个发表了已经快 5 年的帖子,到现在还有跟帖和不断的转帖。即使是交互功能最弱的网络新闻作品,由于其超文本链接形式和评论功能,使得新闻作品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开放系统而不是一个成品。

在网络话语的编码阶段,发起者和参与者之间共同完成是其区别电视话语编码的最大特点。而且,这种开放编码让意义不断发生变化,有时候,发起者的本意会被极大的歪曲。图片怎么拍、文字怎么组织、该配什么样的视频、回帖该用什么风格,超文本链接的制作取决于发起者与参与者的共同的“库存知识”结构以及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发起者因为对代码的正确运用可以极大的影响参与者,成为了编码的主要完成者。在《两》文本中,网友南湖居士在去贵州之前,已经对徐本禹本人有着十分清晰的判断,并以超乎寻常的“同情的态度”去体验徐本禹的支教生活,以具体的方式获得徐本禹的经验而完成编码。而众多的转帖者、跟帖者则是参与者,借助各种理念类型来理解或丰富文本的意义。在发起者和参与者不断交互的过程中,对西部贫困和基础教育的关注,没有变化徐本禹却逐渐由孤独的支教者变为了大学生典型,同时质疑、反思的声音不断出现,一个“多义”的文本不断的呈现新的面貌^[6-7]。

值得注意的是,意义产生依赖的代码系统由于早早的结构进了文化与制度中,从而具有了约定成俗的合理性。而在网络话语中,它因为更多的参与、更强的现场感,加上披上了民主、自由的外衣,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也更容易被权利集团所利用。

在网络话语中,编码与解码阶段很难分割,发起者和参与者在编码的同时又对文本进行解码。不过,参与者解码后不一定会进行再次编码,我们把不继续参与编码的参与者定义为“潜水者”,在网络活动中,这样出于各种动机浏览网页的潜水者比比皆是。事实上,在完成自己认定的意义阐述后,网络话

语中的每个编码者最后都有可能成为潜水者,包括发起者。

无论是潜水者还是编码者,他们都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也就是一系列的对世界的理解来对文本进行“翻译”,从而获得意义。没有一个网友是真正在贵州和徐本禹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包括南湖居士在内,所有网友都是在用自己的经验在解释徐本禹的行为。霍尔说的好,如果意义没有在实践中清楚的表达出来,意义就没有效果^[3]。套用他的话说,如果参与者能够看懂网络文本的意义,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了社会实践,这种“原材料”又为新的编码开始提供了可能。在这样周而复始的传播周期中,网络话语意义呈现动态编码的特点,从而很难准确把握解码者的立场,因此要将网络话语的解码者的立场分类并不容易。

在试图控制网络舆论者的实践中,“支配—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会存在,这是葛兰西霸权理论所假设的立场。发起者的立场完全被解码的网友所认同,网友“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除开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支配企图外,真正值得讨论也许是,无时不刻不在的西方话语体系和统治一切的消费语境。现在的问题是,离开了这个语境,我们还会表达么?因此而形成的话语霸权更为隐蔽,更能让人自觉的被支配^[8]。

更多的时候,“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为大多数网友所接受。网友对发起人所植入文本的意义部分同意。在上述例子中,对贵州山区贫困状况的认同比较一致,而对导致贫困的原因、徐本禹行动的意义则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正是在协商的解码过程中,网友将新的意义植入文本,新的编码者得以产生。这种滚雪球式的编码/解码使得网络话语呈现出庞杂的特点,由于它不可能成为它所指的对象或概念,所以它仍然只是多义的,而不是多元的。

“对立码”(oppositional code)的立场在匿名环境下容易发生。网友看出了发起人和参与者的制码,但选择相反的解码立场。在网络话语中,“集体利益”、“多数人的利益”、“他人的利益”经常被解读为“特权者的利益”或“阶级利益”,对立的立场消解了很多宏大的叙事企图。值得注意的是,言辞激烈或破口大骂不一定是对立,恶搞或者干脆沉默做潜水者则是网络话语下涌现的特有的对立立场,高校校园网论坛实名注册后人气寥落的状况即是印证。

在发起者和参与者无法分开的情况下,比如近年来多起的“人肉搜索”事件中,最初的发起者和最初的参与者的意见纠结在一起,完成最初的制码。解码的过程中支配码、协商码和对立码的三种立场也都会存在。最初的制码越巧妙、越自然,网友参与者采取前两种解码立场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发起者的本意和后来网友采取的行动可能会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

而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网络话语无疑会通过网友的弥散而进入其它的社会表达领域。比如,在《两》帖子发表后一个多月,因为帖子的广泛传播,传统媒体开始大规模对徐本禹事件跟进,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动用了罕见的报道规模,直至将其塑造为时代典型。网络话语体系不断完成生产-传播-再生产的内部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又不断向外弥散,这个过程类似于传统意义的口传和人际传播,也可以用经典的传播流理论进行解释,只不过有时这种传播威力更为巨大和难于控制。这种威力有时候也并不仅仅是塑造典型那样的正面,在多起人肉搜索中,网络话语体系中的意义向现实生活弥散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我们称之为“网络暴力”。

四、结语

霍尔的电视研究理论假设移植到网络话语中究竟有多少的的适用性?它更多提供的是一种消解二元对立的思路,尚需要经过经验层面的论证来加以检验和完善。不过,通过考察,我们还是不难得出结

论,网络话语的意义生产与传播过程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无论是发起者还是参与者,网友通过极其复杂的循环自己“生产”着意义。因此,试图控制网络者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而那些视网络为洪水猛兽者也大可更为乐观:既然意义都是自己生产的,在网络中,我们其实远没有那么被动。

参 考 文 献

- [1] 约翰·费斯克.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 李彬,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84, 144, 159, 291.
- [2] 李南海. 赋予行动以意义——舒茨的意义理论述评[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7(3): 168-171.
- [3] 陆杨, 王毅. 大众文化与传媒[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0: 37-82.
- [4] STUART HALL, D. HOBS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0: 128-131.
- [5] 王磊. 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的三个阶段[J]. 当代传播, 2003(2): 75-77.
- [6] 尚妍, 彭光芒. 媒介、受众与传播效果——“徐本禹”典型报道的传播学解析[J].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3): 5-7.
- [7] 李凤兰, 李金发, 狄金华. 当代青年人的网络道德观解析——解读帖子“两个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J]. 青年探索, 2007(4): 61-64.
- [8] 杨小滨. 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19-56.

(责任编辑:陈万红)

(上接第99页)

领年轻教师集中田间现场备课,再由年轻教师组织教学,确保面向植物保护专业的作物生产教学实习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和效果。另一方面,根据长期开展作物生产教学实习任务的需要,我们对师资队伍进行了更新和补充,每年安排两名新进植物保护专业教师从事作物生产教学实习,这样就形成相对稳定的“三老带两新”的年轻的教师队伍,保证了教学效果。

通过三年的实践,我们认为,面向植物保护专业学生开设作物生产教学实习,不仅激发了学生对植物保护专业学习的兴趣,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完善了植物保护实践教学体系,对具有较强实践创新能力、高素质植物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张维德. 高等农业教育实践性教学国内外比较研究[J]. 高等农业教育, 2000(6): 29-31.
- [2] 丁克勇, 马华力, 孙绪华. 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培养创新人才[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2): 80-82.
- [3] 尹剑豪, 陈学珍. “农事实践基础”课的教学体会[J]. 北京农学院学报, 1991, 6(1): 79-83.
- [4] 程华东. 建立有农林特色实践教学体系的实践与思考[J]. 高等农业教育, 1998(5): 44-47.
- [5] 冯宏祖, 王 兰, 姚永生. 浅谈《农事认知》课程在植保专业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性[J]. 塔里木大学学报, 2007, 19(4): 80-83.
- [6] 崔志峰, 张庚灵, 盖会全, 等. 实践教学“模拟承包”模式初探[J]. 高等农业教育, 2002(11): 80-81.

(责任编辑:侯之学)

面向科学发现优先权竞争的科学期刊发蒙之考略*

王汉熙^{1,3)}, 宋以超²⁾, 周祖德¹⁾, 胡树华¹⁾

¹⁾ 武汉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²⁾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 430070;

³⁾ 武汉理工大学《数字制造科学》编辑部,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考察 16 世纪以后科学信息传播体制的发展脉络。通过牛顿等科学家科学发现优先权争执的公案分析, 归纳出科学研究个体和科学研究能力体系(SRAS)对于获取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关注方向。对造纸术、印刷术、物流业等的考证发现, 15 世纪以后, 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具备以文字传播为形式、邮局发送为路径、印刷复制为工具的基于纸张印刷物的信息传播载体结构(IDSBPP)。以科学发现优先权授予规则为线索, 通过考证发现, 在 15 世纪下半叶以后, 形成了以科学学会为体制的科学共识评判体系, 创立了以科学评论、科学通报和正式论文为主体的科学信息报告形式, 加上学会创办的科学期刊, 组建起一个原型化的基于科学期刊的面向科学发现优先权申报体制。在自然哲学分化为更多的专业学科领域之后, 形成了专业科学期刊。科学期刊是为适应科学发现优先权竞赛而创造出来的革命性科学信息传播体制和工程平台。

关键词 科学研究能力体系; 科学发现优先权; 科学信息传播体制; 基于纸张印刷物的信息传播体制

中图分类号: G23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09)02-0118-06

Emergence of Science Journals Facing Scientific Discover Priority Competition

WANG Han-xi¹⁾, SONG Yi-chao²⁾, ZHOU Zu-de¹⁾, HU Shu-hua¹⁾

¹⁾ College of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²⁾ Hubei Changjiang Press Group Co., Ltd., Wuhan, Hubei, 430070;

³⁾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Digital Manufacturing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ystem since the 16th century. Through analysis on the case of the argument of Newton and other scientists on scientific Discover priority, the concerned direction of individuals of scientific Discover research and the Scientific Discover Research Ability System (SRAS) on acquiring scientific Discover priority is summed up. The study on paper making, printing, logistics and etc. finds that since the 15th century, in Britain and France there has been a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Vehicle Structure (IDVS) based on paper print with written languages as the form, postal delivery as the path and print copy as the tool. Through study on the scientific Discover priority authorization rules as the clue, it is confirmed tha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5th century, a scientific consensus judgment system with science academies as the framework and a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port form with science review, science bulletin and formal thesis as the main body have been formed, a prototype scientific priority oriented declaration system based on science journals was therefore established with science journals setting up by the academies, professional

收稿日期: 2008-11-1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数字平台和互联网络的数字制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平台》(No. E0524508); 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武汉市建设数字形态科学话语结构平台及争夺战略性结点的发展战略》(No. 06021)

作者简介: 王汉熙(1963-), 男, 副编审, 博士生; 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创新与管理。